

# 试论罗易泄密的原因

罗 登 华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大革命时期, 宁汉对峙局面给汪精卫提供了左右逢源、钻营利用的机会, 汪精卫也因此成为打破平衡并影响时局的砝码, 这构成了罗易对其信任的基础, 也是罗易泄密事件发生的客观环境。罗易本人对小资产阶级的双重性认识, 奠定了他向汪精卫妥协退让的思想基础; 罗易与鲍罗廷、唐生智等人之间的矛盾又催化了他走向对汪消极让步的极端, 以至于最终做出把紧急指示向汪精卫泄密的非理智选择, 从而给汪精卫提供了公开反共的口实。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 罗易; 汪精卫; 泄密事件

**中图分类号:** K262;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1)05-0105-07

史学界在论述 1927 年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时, 大多提到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Roy)因给汪精卫看了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而被撤职一事。对罗易泄密事件后果的指责更多于对其原委的探讨。即便稍有论及, 也莫衷一是或少有具体分析<sup>①</sup>。弄清罗易在大革命紧急时期做出如此“蠢事”<sup>②</sup>的原因, 对于理解蒋介石、汪精卫、鲍罗廷、罗易和陈独秀等上层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背景都有所帮助。本文试就汪精卫和罗易这两位事件主角的关系及其所处的复杂环境, 浅析罗易在大革命紧急关头做出这种非理智选择的原因。

武汉政府辖区内接二连三地发生叛乱事件, 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残杀。共产国际在此紧要关头, 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 因为时值 5 月, 常称为“五月指示”。指示的要点是: 没收地主土地, 实行土地革命; 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 武装党员群众, 建立革命军队; 组建军事法庭, 惩办反动军官等<sup>③</sup>。

6 月 1 日, 罗易接到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后, 便把国际只发给鲍罗廷、柳克斯和罗易的电报给汪精卫看, 并于当天晚上送去一个副本。1927 年 11 月 5 日, 汪精卫在广州中山大学作《武汉分共之经过》的演讲, 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6 月 1 日, 苏俄代表罗易忽然约兄弟去谈话, 说: “莫斯科曾有一种决议案, 给我与鲍罗廷的, 鲍罗廷给你看没有呢?” 我说: “没有。” 他说: “我可以给你看。” 他于是把那决议案给我, 一是俄文的, 一是中文的。中文的

在共产国际举行第八次执委扩大会议期间,

收稿日期: 2001-03-06

作者简介: 罗登华(1977—), 男, 四川省遂宁市人,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侯德础教授。

是他们自己翻译出来的。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兄弟说:“可以给我吗?”他当时有些迟疑,最后才说:“今天晚上送给你,因为要修改几个字。”晚上果然送来。[1](581—582页)

这一指示遂成为汪精卫公开“分共”的口实,直接导致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其导火线就是所谓的罗易泄密事件。

那么,罗易为什么要冒着犯“一个组织性错误”[2](435页)的风险,首先把电报给汪而不是给中共或其他人物过目呢?我认为,这首先要从汪精卫在大革命紧急时期所扮演的角色谈起。

## 二

在大革命后期,形成了南昌(后南京)蒋介石集团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对立局面。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中共、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之间逐渐出现裂痕,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方面,罗易与鲍罗廷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分歧。在各种关系的相互交错制衡下,无论哪方能增强力量获得更多的支持,都会形成对局势的执角牛耳之势。在这种背景之下,自外国归来“享有崇高威望”的汪精卫自然就成了多方争取的一个关键人物。

从蒋介石方面看。1925年,蒋通过对廖仲恺被刺案的处理乘势而起,随着其野心的不断膨胀,又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不仅排挤中共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之外,施压于苏联,还以图谋排蒋之嫌逼走了汪精卫,一跃成为国民党的铁腕人物。在北伐时,因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3](124页)。羽翼丰满后的蒋介石掀起了巨大的反共浪潮,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为了增强其反革命力量,他不仅与帝国主义、江浙财阀相勾结,而且还极力拉拢昔日被其逼走的“敌手”汪精卫,以增强其反共的政治势力。“自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起,蒋介石便极力争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支持,以实现其政治上的谋略。……同时,他也促请汪精卫回国领导国民政府”[4](266页)。

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离开法国,取道柏林、莫斯科回国,于4月1日抵达上海。为了取得汪精卫的初步谅解,蒋介石亲往码头迎接,率吴稚晖、李宗仁、白崇禧等到汪精卫下榻的孔祥熙公馆,举行秘密会谈。4月3日,蒋介石即通电“拥汪”。电文中称:

汪主席在党为最忠贞之同志,亦为中正生平最敬爱之师友……电告我军将士,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5]

蒋介石此举意欲何为?武汉政府的苏俄顾问鲍罗廷认为:

蒋介石……甚至还同意让汪精卫恢复职位。而我所说的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松散的、没有骨气的国民党左派,很容易上蒋介石的圈套。……他主张让汪精卫回来,以此来把左派全部收买过来。[6](492页)

可见,在蒋介石眼中,汪精卫是其成就“大业”的一枚棋子,故而声称自己忠于汪精卫,极尽其争取之能事。

蒋、汪的频频秘密接触,国内形势变得瞬息万变,政局也变得错综复杂,外国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中间派和左派各派力量不断游离变动、重新组合。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陈独秀又是如何看待局势的呢?

1927年1月8日,中共中央报告中有一段话极为重要:“我们认为,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以及其他一些将军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如果我们解决不了这个任务,那么整个国民革命运动就将彻底垮台。”[7](63页)

陈独秀曾多次表示,反蒋的军事准备不足,为了争取时间,缓和局势,“应尽可能避免冲突”[8](547页)。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陈独秀于1927年4月4日与汪精卫举行会谈,并签署汪、陈联合宣言。宣言中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7](130页)宣言企图以此澄清国民党右派分子对中共的诬蔑。它不仅折射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欲把汪、陈宣言

作为缓兵之计,把汪精卫作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调停者,也表明了陈独秀企图利用汪精卫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幻想。但更为关键的是,它无疑凸现出汪精卫此时对时局的一种潜在的左右力。

按当时苏俄顾问的说法:“汪精卫是最有威望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只要他立场坚决,他的到来无疑将有助于澄清局势。全党都把汪精卫看作是反对反动势力的最坚决的斗士,看作是蒋介石反革命阴谋的第一个受害者。武汉焦急地等待他自沪莅汉。”[7](126页)

在蒋介石的眼里,汪精卫是其可以利用的反共政治力量,而在陈独秀、鲍罗廷等人的心中,汪精卫又是其可资利用的反蒋工具。正是在这种南京与武汉的对峙中,倍增了汪精卫的身价。

1927年4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评论说:“我们在提高党权的运动中,在反对新军阀的呼声中,……忽然听见离开我们一年的汪精卫同志业经到沪,真是喜极欲狂。”[9]

对于这一局势,汪精卫自己心知肚明。他一面与蒋介石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又利用陈独秀来抬高自己,并以此作为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又用“激进”的左派言词来掩饰自己。1927年5月,汪精卫在汉阳兵工厂发表演说:

本来革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为什么得不到利益,这个原因我们要弄明白。使我们得不到利益的,是有三种人在那里把我们的利益抢去了:第一,帝国主义;第二,帝国主义的老走狗张作霖一般人;第三,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蒋介石一般人。[10]

形势对汪精卫的迫切需要,再加上汪精卫如此虚伪的掩饰,此时的汪精卫在罗易的眼中会是什么样的角色呢?罗易说:“在这样的时刻,国民党不能没有汪精卫。我们希望他已充分恢复健康,能够立即回到工作岗位。我们呼吁一切群众组织和一切革命机构和我们一起,请汪精卫火速回国。”[11](307页)

汪精卫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站在南京与武汉的平衡木上,穿着左派的外衣,喊着反蒋的口号,骗取了共产国际和罗易的信任。因此,正是大革命晚期宁汉各种势力合纵连横的历史背景,造成了罗易对汪信任的基础,这是罗易泄密于汪

精卫的客观环境。

### 三

罗易之所以泄密于汪精卫,从罗易本人身上探讨,主要源于他自己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对罗易在处理与汪精卫的关系时所产生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令他在汪精卫走向背叛革命、投奔右派的道路上,病急乱投医,作毫无原则的争取和让步,最终导致他做出以泄密为代价换取汪精卫信任的既鲁莽又无奈的选择。可以说,泄密事件是罗易以让步换取汪精卫信任发展的顶峰。

罗易对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认识一直都充满矛盾。

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产生自手工业者(其基础已被帝国主义所破坏)而是地主阶级,并与各封建阶层有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有密切联系”,因此,它在客观上“没有能力”、在主观上“反对实现中国革命的社会目标——消灭封建主义”[12](401页)。另一方面,“如果大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拉到他们那方面去,无产阶级就会陷于孤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资产阶级转向大资产阶级,革命就会失败”[13](352页),“因此,武汉时期的任务就是加强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14](451页)。

一方面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另一方面又深感蒋介石集团对汪精卫极力争取的压力和失去小资产阶级的危机感。真是欲罢不能,进退失据。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做的就只有尽力争取了。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

分析这种矛盾心态产生的渊源,首先要归于共产国际的影响。

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十一次会议时递交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左翼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大多数国民党员属于左翼。它联合城市的中、小商人,中、小农民和佃农以及知识界。左翼的主要领袖是汪精卫。”[15](182页)

共产国际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呢?192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其中指出:“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是革命因素。它过去起过、将来也还会起重要作用,但它不能独立行动——它要么是跟随资产阶级,要么是跟随无产阶级。”[16](279页)虽是一种“革命的因素”,但又不能让它“独立行动”,这就是共产国际对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认识。

后来,随着蒋介石的叛变和中国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共产国际的这种认识得到了加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就其主要倾向来看,是城乡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虽然某些将领及其集团、国民党‘左翼’的某些政客或其集团,今后仍然可能、甚至必不可免地要叛变,但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必然会把群众发动起来,而群众的运动乃是未来胜利的保证”[17](324页)。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各主要阶级力量重新调整组合。面对这种局势,共产国际要指导中国革命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策略。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蒋介石的政变意味着各种阶级力量的重大改组,因此,共产国际的策略就应当以这个新形势为依据。”[17](321页)

要适应这个“新形势”,就必须在中国各种阶级力量急剧改组的时候尽量争取更多的支持,所以,“今后仍然可能、甚至必不可免地要叛变”的小资产阶级因为是一种“革命的因素”,仍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共产国际的在华代表罗易就是带着共产国际对小资产阶级和汪精卫的这种双重性认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

另一方面,罗易对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双重性认识,还主要基于以下的考虑。

首先,罗易是基于在“四一二”政变后,他对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微妙关系的理解。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罗易在分析中国革命未来的前途时说:

目前,大资产阶级和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已背离国民革命阵线。因此,革命队伍中的

阶级矛盾已有相当程度的减少。……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现阶段的革命基础。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正在剥削和压迫这三个阶级。这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将因此比前一时期的统一战线更为单纯。[18](369页)

其实,正如本文前面所叙,“目前”的形势并不是罗易所想象的那么“单纯”。因为汪精卫正在利用南京、武汉的对峙局面,阴险地扮演着“左派”的角色,以“反蒋”之名而行蓄势夺权之实。罗易之所以认为“蒋介石等大资产阶级脱离革命后,国民党内部的冲突因之减少,国共两党关系比从前更加密切,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遂因之实现”[19](432页),一方面是缘于汪精卫“左派”口号的雾障,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对汪精卫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自负认识所造成的。他认为:“小资产阶级左翼不能跑到蒋介石那里去,如果附蒋,就是在政治上自取灭亡。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可能并不是特别敏锐的,但它懂得这一点。”[18](371页)

其次,罗易是基于对小资产阶级加入革命阵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自信判断。他认为当资产阶级转而反对革命时,摆在小资产阶级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

或者参加革命,或者抛弃革命;或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解救自己,或者跟着资产阶级加入反革命阵营。……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由于这个原因,它必须参加被剥削阶级的联盟。[20](386页)

罗易认为小资产阶级一定会加入革命阵营,还因为“在中国,资产阶级本身是如此软弱,它不可能为了把小资产阶级拉向自己一边而给它什么好处”[20](386页)。与此相反的是,进行土地革命,却能给小资产阶级带来“直接的好处”:

如果实行土地改革,采取了废除垄断农产品的措施,物价就会下降。这将有利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果由于土地改革,改善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就会使国内贸易兴旺起来。农民将有更多的农产品出卖和有更高的购买力,由此提高贸易额,城市商人就将从

这里得到好处。这就是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后,小资产阶级能得到的直接好处。[20](388页)

认为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不仅有加入革命阵营的可能性,而且因为“土地改革”能够给予他们资产阶级所不愿给他们的“直接好处”,所以他们一定会加入革命阵营。这就是罗易对汪精卫和小资产阶级加入革命的“前景”充满自信的原因。在罗易看来,小资产阶级一面受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压迫,一面受封建阶级的剥削,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带领它去同这些压迫者斗争,那么它就会参加革命运动[14](456页)。正是出于对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这种立场的判断,罗易才坚信:“动员革命民主力量——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保证。”[21](331页)就是为获得这种“唯一保证”,罗易才会在实际中不遗余力地去争取汪精卫。他首先是强调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

在国民革命的现阶段,为了加强左派,为了帮助它,鼓励它同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作斗争,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22](435页)

至于为什么中共要留在国民党内,罗易解释得很清楚:

我们同国民党建立关系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目前我们同国民党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使小资产阶级更坚定地参加革命斗争,使他们脱离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影响。[22](438页)

其次,当土地革命的火焰触及小资产阶级时,共产国际也强调“共产党的任务,应当是全力巩固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阵线。应当全力发展土地运动,同时要保证小资产阶级劳动财产不受侵犯”[17](333页)。

不难看出,即便是土地革命也要让步于维护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罗易正是怀着对汪精卫的这种矛盾心情,带着几分“自信”,一步一步地走上为换取“团结”而不停让步的道路。

在这条求妥协的道路上,由于与鲍罗廷的矛

盾和鲍的“唐生智方向”,更促使罗易走到“让步换取信任”的顶峰——泄密事件的发生。

在国民革命紧急时期,鲍罗廷对唐生智抱有幻想,以为唐生智在取得东南之野心未遂时,还不至于与我们决裂。鲍罗廷说:“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联对武汉政府之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跑掉。”[23](535页)尽管罗易对鲍罗廷“把军队联合在唐生智领导之下”的策略十分反对,但是由于“一切权力都集中在鲍罗廷手中。……他处于主导地位,因而在共产党内起着独裁者的作用。中共最高领导大部分是他的信徒,思想上也和他相似。因此他们一味追随他,根本不顾共产国际反复发出的指示,也蔑视共产国际在场的代表”[24](72页)。对此,罗易深感气愤,认为“共产党所采纳的鲍罗廷把军队联合在唐生智领导之下的愚蠢策略,把汪精卫推到了反革命集团的怀抱”[24](73页)。同时,他又对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汪精卫的“左右为难”的处境和汪“站在快要下沉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船上”的“悲剧的角色”深表同情[24](73页)。在罗易看来,汪精卫抱怨“虽然俄国人劝他回到中国并使他成为武汉政府的首脑,但现在共产党人却在和军阀一起密谋来推翻他”[24](74页),似乎是一种事实,是鲍罗廷“疏远”了汪精卫,是唐生智愚弄了共产党,是共产党“出卖”了汪精卫,而罗易由于和鲍罗廷的矛盾与没有实权,对此,亦无能为力。眼看着汪精卫逐日失掉对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信任”,眼看着唐生智的反革命计划就要实现,罗易最后能做的又有什么呢?历史留给他的便只有带着对汪精卫最后的幻想,去给予他“最起码的信任”,去把他“从反革命集团中分离出来”[24](74—76页)。因为,“唐生智既还需要国民党这块招牌,便不能不屈就汪精卫一些主张,所以拉住汪精卫还是一切政治问题的中心”[23](535页)。

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发来的五月紧急指示便成为此时罗易手中能够打出去的王牌。如果能在关键时刻以此为代价,通过“重申他在莫斯科时对他本人许诺的保证”[24](76页),重新获得汪精卫的信任,通过汪精卫继而控制整个一触即发的局势,对于罗易来说,打这张风险牌

也许是唯一的,也是值得的。正如罗易在回忆中所写的那样:

汪精卫的背叛意味着武汉政府的瓦解,而对反动派来讲,无论他们是蒋介石的盟友或是对头,这都是一个完全的胜利。……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该做出最后的努力,重新获得汪精卫的信任。于是,我把莫斯科的信息告诉了他。[24](75—76页)

罗易泄密事件就这样发生了,对于其严重后果,学界早有公论,此不赘述。

循着罗易泄密的前后经过,我们不难发现: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南京的对峙局面给了汪精卫左

右逢缘、钻营利用的机会;而罗易本人对小资产阶级的双重性认识,奠定了他向汪精卫和小资产阶级妥协退让的思想基础;罗易与鲍罗廷、唐生智等人之间的矛盾又催化了他走向对汪消极让步的极端,以至于最终做出把紧急指示泄密于汪精卫的非理智选择,从而给汪精卫提供了公开反共的口实。我们应该承认,泄密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既不是罗易的“极端糊涂的行为”,也不是他刻意背叛革命,罗易只不过恰好扮演了一场悲剧的启幕者而已,因为他毕竟没有能力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

#### 注释:

- ①参见刘继增、毛磊、袁继成著《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53—454 页。
- ②毛泽东曾评价罗易在武汉的言行，说他是一“蠢货”。见斯诺著《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39 页。
- ③指示的内容详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〇七号（特字第八十五号）记录（摘录）》，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66 辑，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7—178 页。

#### 参考文献:

- [1]汪精卫. 武汉分共之经过[A]. 转引自黄修荣. 国民革命史[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罗易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1927-08-30)[A].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4册[M].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 [3]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A]. 周恩来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4]郭成策.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A].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5]蒋中正专心旅之通电[N]. 申报,1927-04-04.
- [6]鲍罗廷. 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A].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4册[M].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 [7](苏)A. B. 巴库林. 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8]特委会记录(1927-03-25)[A]. 转引自:黄修荣. 国民革命史[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 [9]汉口民国日报,1927-04-06.
- [10]汉口民国日报,1927-05-11.
- [11]罗易. 一个警告(1927-02-27)[A].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第5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 [12]罗易. 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1927-05-04)[A].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第5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 [13]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04-29)[A].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第5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1998年.
- [14]罗易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1927-09-17)[A].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4册[M].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 [15] 谭平山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 第一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16] 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1926—12—16):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 第一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27-05)[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 第一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18] 罗易. 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1927-04-30)[A].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 第5册[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 [19] 罗易.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之意义(1927-05-13)[A].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 第5册[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 [20] 罗易. 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1927-05-03)[A].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 第5册[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 [21] 罗易. 革命的基础和社会力量(1927-04-13)[A].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 第5册[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 [22] 罗易.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1927-05-24)[A].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 第5册[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 [23] 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09)[A].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 第5册[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 [24] 罗易. 对大革命失败的回忆[A].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七辑[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Attempt at Reasons for Roy's Revelation of the Party Secret

LUO Deng-hua

(History Department,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First Civil Revolutio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Wuhan and Nanjing governments gives Wang Jingwei a chance to butter both sides of his bread and make him a weight that can destroy the balance and influence the situation further. This is the foundation for Roy to trust Wang and the objective circumstance for the happening of Roy's revelation. At the same time, Roy's understanding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s duplicity is the ideological basis for him to make compromise and concession to Wang. Roy's conflict with Borodin and Tang Shengzhi prompts him to unreasonably reveal the emergent instruction to Wang, who uses it to oppose the communist party.

**Key words:** during the First Civil Revolution; Wang Jingwei; Roy; revelation

[责任编辑: 凌兴珍]